

日本京都中國學與東亞文化

著者／連清吉

日本漢學叢刊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日本京都中國學與東亞文化

連清吉 著

臺灣 學生書局 印行

自序 古典文獻主義

1906 年京都大學創立文科大学，狩野直喜擔任中國文學教授，翌年，內藤湖南聘任為東洋史講師，開啟了京都中國學研究的端緒。一般以為京都的中國學是以清朝考據學為基底的科學實證之學。狩野直喜繼承太田錦城、海保漁村、島田篁村一派的考證學，潛心於清代乾嘉的學術與清朝的制度。內藤湖南則是遠紹章學誠、錢大昕的學問宗尚，以史學的角度綜觀中國的學術發展。其實京都學派的學問性格，特別是內藤湖南的學問，不純然只是考證而已；乃是在目錄學的基礎上進行旁徵博引、精詳考證，而建立通貫宏觀的歷史識見。又由於京都自古即是日本文化之所在，而且有與江戶中期以來考證學風的傳承，在此學術環境下，「學問與趣味兼容並蓄而渾然融合的研究，才能真正地理解中國文化」，則是京都學者的為學理念。故京都中國學的學問可以說是以科學實證為學問方法的經史文化之學。

內藤湖南應聘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講師以來，於安定的環境下，以學者的生活，貫徹其以中國學的沉潛為天職的志向，窮究其學識與精力於東洋史的研究，凝集其學問於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洋文化史學。至於其在學問的研究上，則以中國的史學傳承為淵源，既以劉知幾所謂才學識的兼備為是鑽研歷史的素養，又以劉向、劉歆父子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為史學的方法，章學誠的「獨斷」

為是史論的理論根據，而成就「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學究極。

狩野直喜的學術成就除以清朝考證學為機軸而樹立京都中國學外，於敦煌學的草創、宋元戲曲和《紅樓夢》之俗文學與小說研究的開拓和東方文化事業的策畫，堅持為學術而學術之理想而創立「東方文化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前身）等，都是具有開創性的不朽的文化事業。京都中國學得以匹敵北京、巴黎而為世界三大漢學中心之一，狩野直喜是居功厥偉的。雖然狩野直喜遭受「中國崇拜」之譏，而其學問的根底及其學術成就即在中國學的沉潛與發揚。

內藤湖南與狩野直喜或可並稱為京都近代中國學的雙璧，二人不但各有專擅，內藤湖南沉潛於東洋文化史與滿清史的研究，狩野直喜則致力於中國經學、文學與清朝制度史的鑽研，又開啟日本研究敦煌文物的先聲，且能為漢詩文而與當時中國的文人學者酬唱應對。故其所窮究的是能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比肩的通儒之學。其弟子如武內義雄、青木正兒、神田喜一郎、宮崎市定、吉川幸次郎、貝塚茂樹、小川環樹等人亦能繼承師學，既有堅實的學問素養，成就博學旁通的學問，又能優遊於詩文藝術，進而樹立以實證為主體的學風，建立日本近代中國學，與北京、巴黎分庭抗禮，並列為世界漢學的中心。

究明京都中國學派之二祖（內藤湖南、狩野直喜）三宗（武內義雄、宮崎市定、吉川幸次郎）的學問宗尚，即能理解日本近代中國學的究竟。

連 清吉 2010年2月序於長崎

日本京都中國學與東亞文化

目 次

自序 古典文獻主義	I
前言：京都中國學派的二祖三宗	1
狩野直喜：京都中國學的創始者	15
內藤湖南：日本近代的文化史學家	55
武內義雄：日本近代諸子學的先驅	77
宮崎市定：日本東洋史學的巨峰	101
吉川幸次郎：日本近代中國文學的泰斗	133
結論：京都中國學的特質	161
跋 悼眉叔師：啓我矇昧，指我津梁	183
附 錄	
京都中國學者的時空座標論	187
章學誠與內藤湖南	211
神田喜一郎及其《敦煌學五十年》	229

近代中日學者的文化交流

——以董康「書舶庸譚」的載記為例.....	247
日本近代的文化維新主義.....	269
環中國海港市文化的構築.....	287
臺灣儒學文化與二十一世紀東亞文藝復興.....	303
原載刊物一覽	317

前言：

京都中國學派的二祖三宗

關鍵詞 京都中國學 二祖 三宗 考證學 文化史學 東洋史學
中國思想史學

前言：京都中國學即考證學的再思

1906 年京都大學創立文科大学，狩野直喜擔任中國文學教授，翌年，內藤湖南聘任為東洋史講師，開啟了京都中國學研究的端緒。一般以為京都的中國學是以清朝考據學為基底的科學實證之學。①狩野直喜繼承太田錦城、海保漁村、島田篁村一派的考證學，潛心於清代乾嘉的學術與清朝的制度。②內藤湖南則是遠紹章

① 狩野直喜說：「我（的學問）是考證學。」（小島祐馬〈通儒としての狩野先生〉《東光》第五號，1978 年 4 月）。興膳宏也說：所謂京都學派的學問，一言以蔽之是清朝考證學。（興膳宏：〈吉川幸次郎先生の人と學問〉，《異域の眼》，東京：筑摩書房，1995 年 7 月）。

② 有關乾嘉考據的探討是狩野直喜《中國哲學史》（東京：岩波書店，1952 年

學誠、錢大昕的學問宗尚，^③以史學的角度綜觀中國的學術發展。其實京都學派的學問性格，特別是內藤湖南的學問，不純然只是考證而已；乃是在目錄學的基礎上進行旁徵博引、精詳考證，而建立通貫宏觀的歷史識見。^④又由於京都自古即是日本文化之所在，而且有與江戶中期以來考證學風的傳承，在此學術環境下，「學問與趣味兼容並蓄而渾然融合的研究，才能真正地理解中國文化」，^⑤則是京都學者的為學理念。^⑥故京都中國學的學問可以說是以科學實證為學問方法的經史文化之學。

一、內藤湖南（1866-1934）的學問

東洋的學問未以邏輯論理的思考與論述見長，然內藤湖南則是

12月）一書最精彩的所在。又代表乾嘉以來學術之一的《左傳》《公羊傳》，狩野直喜也有《春秋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94年11月）的專著。至於清朝制度的論著則有《清朝制度與文學》（東京：みすず書房，1984年5月）。

③ 內藤湖南的學問是取法章學誠、錢大昕的記載，見於神田喜一郎的〈內藤湖南先生と支那上古史補遺三題〉，《敦煌學五十年》，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7月。

④ 以內藤湖南的學問為精審考證而又有宏觀識見的評論，見於神田喜一郎的〈內藤湖南先生と支那上古史補遺三題〉（《敦煌學五十年》所收）及內藤湖南著《日本文化史》（下）（講談社學術文庫77，1976年11月）所附的桑原武夫的解說。

⑤ 神田喜一郎〈大谷瑩誠先生と東洋學〉，《敦煌學五十年》，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7月。

⑥ 狩野直喜兼治經傳文學，又能詩善文，書法也自成一派。內藤湖南於史學的著述外，也能為詩文和歌，更著有《支那繪畫史》，論述中國繪畫的歷史。

少數的例外。如以螺旋史觀考察東亞文化的發展，以歷史加上說探究中國古史傳說形成的軌跡，以通變史觀說明中國文化史的變遷等，皆為其體系化架構學問的表現。至於其所以能考竟時代地域的異同，辨明學術文化的原始本末，而成就一家之言，固然與其以中國史家的才學識兼備為學問的究極有深厚的關連，但是其個人的際遇，生存的時代，生活的地域，學問的意識亦不無決定的影響。

秋田師範畢業是內藤湖南的最高學歷，雖沒有接受大學的教育，卻也沒有所謂學派家學的束縛，乃能成就獨特的學問。上京以後的二十年雜誌編輯與記者的生涯，養成其博聞強記的根底。至於其生存的明治時代是文明開化的時代，西化革新是時代的風尚，學問方法的突破更新自然應運而生。任教大學至逝世的京都二十餘年歲月，成就了內藤的文化史學，既於傳統與現代之間，守成而創新，又在對抗於東京的學問意識下，融合西歐的合理主義、清朝的考證學與江戶時代的文獻主義而樹立以考證為基礎的日本近代中國學。

一八九九年三月遭祝融之災，所有的藏書付之一炬，內藤湖南逕稱以往所從事者皆為雜學，今後則專心致力於中國問題的研究。一九〇七年應聘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講師以來，於安定的環境下，以學者的生活，貫徹其以中國學的沉潛為天職的志向，窮究其學識與精力於東洋史的研究，凝集其學問於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洋文化史學。至於其在學問的研究上，則以中國的史學傳承為淵源，既以劉知幾所謂才學識的兼備為是鑽研歷史的素養，又以劉向、劉歆父子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為史學的方法，章學誠的「獨斷」為是史論的理論根據，而成就「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學究

極。^⑦

二、狩野直喜（1868-1947）的學問

狩野直喜是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学草創期，樹立京都中國學派的主導性代表人物之一。^⑧狩野直喜生於明治元年，感受明治文明開化的時代風潮而成就其樹立新中國學的事業。其接受啟蒙教育的熊本「濟濟齋」異於藩校「時習館」之繼承儒家傳統而以武士道精神和皇室中心主義為校訓的學風，而以西洋之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為宗尚。又鑑於日本與中國、朝鮮的歷史文化淵源和挽救在全盤歐化的潮流下，東亞文化同體之共識逐漸衰微的頹勢而教授中國語和朝鮮語。因此突破創新與維護傳統的文化使命成為狩野直喜的血脈。^⑨

明治 25 年（1892）入學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学漢文科，師事島田篁村（1838-1898），傾心於《皇清經解》的鑽研，沉潛於清朝考證學的探究，繼承大田錦城—海保漁村—島田篁村之考證學風，奠

⑦ 有關內藤湖南的學問，參見清吉〈內藤湖南——日本近代的文化史學家〉，《笠征華甲紀念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 年 12 月，頁 307-324。

⑧ 高田時雄〈支那語學支那文學 狩野直喜〉，《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 年 5 月，頁 4。有關狩野直喜的敘述頗參採之。

⑨ 「濟濟齋」於中國語和朝鮮語的教授與對東亞歷史文化的重視，見狩野直喜〈佐佐先生胸像記〉：「夙思清韓與我關係緊密，設兩國語科，選生徒學習，且勸遊歷，以睹形勢。」（收載於《君山文集》卷五。）

定其與內藤湖南以清朝考證學建立京都中國學的基礎。^⑩

明治 34 年（1901）8 月留學上海，結識羅振玉，涉獵「亞洲文會」圖書館所藏歐洲東洋學的著作，洞察新方法的建立與新領域的開拓是西歐東洋學的精彩而為日本漢學闕如的所在。其知交於內藤湖南亦在此時。

明治 36 年（1903）4 月歸國，參與臺灣舊慣調查事業而編纂《清國行政法》，於狩野直喜以制度和文學的關係研究清朝文化而講述《清朝の制度と文學》有極大的影響。明治 39 年（1906）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創立，狩野直喜受命為文科大學，於哲學科教授中國哲學史，二年後，文學科成立，講授中國文學和中國語學的課程。明治 41 年（1908）至昭和 3 年（1928）退休，講述「清朝學術」「清朝經學」「清朝文學」「清朝制度と文學」「公羊研究」「左傳研究」「論語研究」「孟子研究」「兩漢學術考」「魏晉學術考」「支那小說史」「支那戲曲史」等。

狩野直喜的學術成就除以清朝考證學為機軸而樹立京都中國學外，於敦煌學的草創^⑪、宋元戲曲和《紅樓夢》之俗文學與小說研究的開拓^⑫和東方文化事業的策畫，堅持為學術而學術之理想而創

⑩ 小島祐馬〈通儒としての狩野先生〉（《東光》第 5 號，頁 7），高瀬武次郎〈君山狩野直喜博士を追慕す〉（《東光》第 5 號，頁 64）。

⑪ 狩野直喜於敦煌學的成就，詳見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東京：筑摩書房，1960 年。

⑫ 狩野直喜有《支那小說史》《支那戲曲史》的講述，又有關中國小說與俗文學的主張，亦見於其所著的《支那文藝》，東京：弘文堂，1927 年出版，東京：みすず書房，1973 年補訂出版。

立「東方文化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前身）^⑩等，都是具有開創性的不朽的文化事業。京都中國學得以匹敵北京、巴黎而為世界三大漢學中心之一，狩野直喜是居功厥偉的。雖然狩野直喜遭受「中國崇拜」之譏，而其學問的根底及其學術成就即在中國學的沉潛與發揚。^⑪

三、武內義雄（1886-1966）的學問

武內義雄，三重縣人，明治 40 年（1907）9 月，入學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学支那哲學史講座，大正 12 年（1923）4 月，聘任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支那哲學史教授。昭和 3 年（1928）4 月，以《老子原始》獲得京都大學文學博士。昭和 17 年 5 月兼任帝國學士院會員，20 年 4 月任命宮內省御用掛，21 年 5 月自東北大學退休，24 年 3 月辭退宮內省職位，35 年 11 月獲文化功勞之表彰，39 年 11 月頒授二等旭日重光勳章。所著《老子原始》《諸子概論》《論語の研究》《易と中庸の研究》等書編纂成《武內義雄全集》十卷，於 1978、9 年，由角川書店出版。金谷治稱武內義雄是日本

⑩ 東方文化學院設立的經緯，詳參山根幸夫〈東方文化學院の設立とその展開〉（《論集中國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1981 年）。狩野直喜堅持學術文化理想的主張，見載於日本外務省外交資料館編《總委員會關係雜件》第 2 卷，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五十年》。

⑪ 高田時雄〈支那語學支那文學 狩野直喜〉，《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 年 5 月，頁 26。

樹立中國思想史方法的第一人。¹⁵

武內義雄授業於狩野直喜與內藤湖南，以清朝考證學與目錄學為學問的基礎，於嚴密的校勘與正確訓詁之上，進行辨章學術，考竟源流的研究，又繼承富永仲基、內藤湖南的「加上」學說，以原典批判的觀點展開古典文獻，特別是先秦諸子的考證，開啟日本近代中國學於諸子研究之先聲。博士論文的《老子原始》（1926年）對《老子》原文與《史記·老子傳》進行批判性的論述，考證《老子》成書及老子存在的年代，又以《老子》散文與韻文混雜於一書之中，通過綿密的實證和體系性的分析內容，而提出《老子》有原始思想的部分和後世附加法家、兵家、縱橫家等思想的部分的結論。《論語の研究》（1939）則是武內義雄運用原典批判方法而進行文獻考證的代表性著作。不但利用伊藤仁齋和崔述的研究方法，對《論語》的字句章節進行考察，更以目錄學的方法，究明《論語》的來歷，提出今本《論語》二十篇可分成河間七篇本、齊魯二篇本、齊所傳七篇、《論語》原本所無三篇等四個部分，而以河間本（〈為政第二〉至〈泰伯第八〉）為最古資料的結論。至於探究周末以迄漢初之道家思想變遷的《老子と莊子》（1930年），《易》和《中庸》於思想發展有共同背景的《易と中庸の研究》（1943年），是武內義雄以文獻批判進行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結晶。《支那

¹⁵ 武內義雄之學衛生平，參〈先學を語る—武內義雄博士—〉（《東方學》第五十八輯，1979年7月，其後收入《東方學回想》V，頁187-211，東京：刀水書房，2000年4月），金谷治〈誼卿武內義雄先生の學問〉（《懷德》27號，1966年），金谷治〈武內義雄〉（《東洋學の系譜》頁249-259，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年11月）。

思想史》（1936年，後改名《中國思想史》）是武內義雄樹立「思想史學」的代表作，甫一出版即翻譯成中文，與前後出版的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並稱為有關中國思想史的劃時代的代表著作。^{①⑥}為其門下金谷治與再傳弟子町田三郎先生發揚其學問，建立東北大學中國哲學史研究為當代日本諸子學研究之重鎮的地位。

四、宮崎市定（1901-1995）的學問

宮崎市定，長野縣人，1922年4月入學京都帝國大學史學科，1944年5月任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教授，1947年4月，以《五代宋代の通貨問題》獲文學博士，1958年5月，以《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獲日本學士院賞。著有《宮崎市定全集》二十五卷等書。^{①⑦}

①⑥ 金谷治〈誼卿武內義雄先生の學問〉（《懷德》27號，1966年），金谷治〈武內義雄〉（《東洋學の系譜》頁249-259，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年11月）。

①⑦ 宮崎市定的生平著述參〈宮崎市定自訂年譜〉（《自跋集——東洋史學七十年》，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5月）、《東方學》2000年9月第百輯所載的〈宮崎市定博士年譜〉、〈宮崎市定博士著書目錄〉，又關於其學問的介紹，則有日比野丈夫〈宮崎先生を偲んで〉、竺沙雅章〈宮崎先生の追憶〉、橫山修作〈宮崎先生を憶う〉（皆收於《東方學》1996年1月第91輯），〈先學を語る—宮崎市定博士—〉（《東方學》2000年9月第百輯），島田虔次〈宮崎史學の系譜論〉（《宮崎市定全集》月報25，東京：岩波書店，1994年2月），磯波護、間野英二〈東洋史學宮崎市定〉（《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會，2002年5月）。尤其是《自跋集——東洋史學七十年》是理解宮崎市定學問性格的最佳資料。

宮崎市定以博通的視野廣泛地涉獵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的歷史變遷，又潛心於西域的研究。於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提出「景氣變動史觀」以考察社會、經濟、政治等文化現象的變遷，又蒐集西亞的文獻，學習阿拉伯文，以探究東西文化交流關係的歷史，為當時研究東西關係史的第一人。因此宮崎市定不只是中國史學家而是東洋史學家。一般以為宮崎市定是內藤湖南史學的繼承者，但是宮崎市定自稱就客觀的考察事物，徹底的解讀史料之研究方法而言，其比較接近桑原隲藏。¹⁸

宮崎市定的學問性格是精細的個別實證研究和闊達雄渾的通史性敘述，進而強調通史為史學家的究極。¹⁹因此，其於中國歷史的研究，是以實證的方法考察政治、經濟、社會等個別分野的變遷，進而體系性的架構中國史學的發展脈絡，探究中國歷史於世界的定位。至於洞察西亞的歷史性意義，即是以通史為史學家究極的產物。

磯波護將宮崎市定七十年的講述生涯區分為「一九二九年四月〈上海から廣東まで〉的遊紀到一九四五年夏日本敗戰的二十年」，「戰後至一九六五年京都大學退休的二十年」，「退休以

¹⁸ 宮崎市定《アジア史研究 第一・はしがき》。又島田虔次於〈宮崎史學の系譜論〉指出：宮崎市定的學問淵源於狩野直喜的漢文修養和中國制度史研究、內藤湖南的中國史學論和桑原隲藏的史學方法論。（《宮崎市定全集》第二十四卷月報二十五，東京：岩波書店，1994年2月，其後收入島田虔次《中國の傳統思想》，東京：みすず書房，2001年5月，頁329-337。）

¹⁹ 《宮崎市定全集・刊行にあたって》。

後，優遊自適於著述的三十年」等三個時期。^②

第一期的學問成就在於中國經濟制度史和東西關係史的研究。當時的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的研究以內藤湖南之文化史學為主導，而未留意東京大學加藤繁所開拓的經濟史研究領域。宮崎市定乃從制度史的角度來探討中國經濟發展的軌跡。其於賦稅制度的考察，有〈晉武帝の戸調式に就いて〉（1935 年）一文，提出唐代均田制起源於晉的占田課田制，進而上溯三國魏的屯田制度。至於〈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1943 年）的博士論文則是其經濟制度史研究的大成。

宮崎市定於中國古代史的研究方法是內藤湖南「文獻學」與濱田耕作「考古學」的結合。其自稱有關中國賦稅制度的〈古代支那賦稅制度〉（1933 年）與城郭起源試論之〈支那城郭の起源異說〉（1933 年）是「紙上考古學」。雖然如此其於〈支那城郭の起源異說〉所謂「中國亦有如希臘之都市國家存在」的提出則是日本東洋史學界的先聲。其後著作《東洋における素樸主義の民族と文明主義の社會》（1940 年）不但說明古代以來東洋世界之北方遊牧民族與南方農耕定著社會的抗爭未必只是生活方式和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更是根植於民族深層之人生觀殊異的對抗，對於中國社會的特質，如中國文明的發祥地與山西省解池消費地域有密接的關連，春秋時代亦有如希臘城郭都市生活營為的強調，都有其獨創性的見解。

② 磯波護、間野英二〈東洋史學宮崎市定〉，《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會，2002 年 5 月，頁 220-250。

1936年2月至1938年8月的二年半歐洲訪問研究是宮崎市定學術生涯的重要關鍵。^④宮崎市定於大學畢業時，其師桑原隲藏屬其研究東西關係史的問題，由於未體認到西亞研究的意義和重要性而專致於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研究。但是兩年在研究，與西方學者的交流，東西史料文獻的調查，收藏銅版畫等東洋趣味的藝術品和東西方地圖，又走訪歐洲各地美術館和博物館，目睹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文明，而埋首於東西關係史的研究。著述〈東洋のルネサンスと西洋のルネサンス〉（1938年）〈十八世紀フランス繪畫と東亞の影響〉（1947年）〈毘沙門天信仰の東漸に就て〉（1941年）等有關東西藝術、宗教的問題，至於《菩薩蠻記》（1944年）既記載西亞旅行的見聞，又概述西亞的歷史。其於西亞歷史的研究是日本人論述西亞歷史的先驅。

宮崎市定的第二期學術成就是「景氣變動史觀」的建立。當時的日本中國史學界盛行以唯物史觀作為研究的根據，於中國歷史的時代區分也有所論爭。宮崎市定著述《東洋的近世》（1950年），從東西文化關係的觀點，強調東洋的近世是國民主義（nationalism）勃興的時代，又在內藤湖南所未涉及之社會經濟史的領域，以實證的方法究明五代至明朝之社會經濟的特徵及其異於中世的所在，以補足內藤湖南宋代為中國近世的主張。宮崎市定於六十歲時，在歐美講學的兩年，目睹景氣變動對社會各方面的影響，於是蘊釀以

④ 間野英二〈宮崎市定の西アジアへの親近感〉，收載於磯波護、間野英二〈東洋史學宮崎市定〉，《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5月，頁240-250。